

委託執行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研究 —以中部三縣市為例

翁毓秀



壹、前言

早在 1993 年兒童福利法通過時，臺灣地區強制性親職教育就有了法源的依據，也開啓了親職教育實施的新頁。親職教育在國內長久以來都是屬自願性質的教育活動。但在 1993 年的兒童福利法通過之後，政府需依法對於虐待或疏忽兒童的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執行強制性親職教育。1993 年的兒童福利法中規定為四小時以上，到了 2003 年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中的規定則將強制性親職教育的時數從 4 小時以上，一口氣調高到 8 到 50 小時。2011 年修訂通過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01 條之規定，兒童及少年的父母、監護人或主要照顧者有違反第 56、95、96、99 條等相關規定者得令其接受 8 至 50 小時的親職教育輔導。由此可見，社會對於提供施虐者強制性親職教育具高度的重視與期待。

臺灣地區兒童少年保護案件，自 2006 年超過 1 萬件（10,094 件）以來，經短短 5 年到 2011 年的案件數已達 17,667 件（內政部兒童局，2012），成長了將近 75%，數量成長實

在驚人。依據 2011 年通過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01 條之規定，兒童及少年的父母、監護人或主要照顧者有違反第 56、95、96、99 條等相關規定者得令其接受 8 至 50 小時的親職教育輔導。由於兒童及少年的父母、監護人或主要照顧者並非自願參與親職教育輔導，兒童福利工作人員或社會工作人員常稱之為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以有別於其他親職教育輔導課程。

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實施的主要目的在於對遭通報之施虐父母或兒童之主要照顧者實施親職教育輔導，以預防施虐再度發生，並達到保護兒童的目的。在兒童虐待案件持續上升的狀況下，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需求勢必也會上升。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在國內也已實施了將近 20 年（1993 至今），這項業務縣市政府通常委託給當地的民間單位來執行。本研究試圖從中部三縣市政府委託當地民間單位執行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過程，了解委託辦理的狀況、執行模式、時數的訂定、遭遇困難及委託的滿意狀況等方面的資料，以做為委託強制性親職教育業務時

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親職教育的意義

「親職教育」的實施內容是提供父母教養子女的知識、技能與態度，以期待他們扮演稱職父母的角色。實施的方式是藉用正式或非正式的課程施以專業教育，藉以培養其教養子女的專業知能，而能有效發揮父母職能。親職教育是教人如何為人父母的教育，所以所規劃的內容應是配合父母的需要，並不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而是在有限的時間和能力內，達到某些教育目標（林家興，1997）。

「親職」的定義，顧名思義「親」是指父母親，「職」意謂職責本份，「親職」則是指擔任父母親所需負起的責任。親職也是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行為的表現，是許多情感結合而成的經驗（邱書旋，1995），如果為人父母者對親職角色適應良好，則會有自我實現、自我提升及擁有價值感，和孩子相處也較融洽，面對親職角色所賦予的權利與義務時，也會比較有責任感，較願意學習且態度比較樂觀（鍾思嘉，1998）。

所謂親職教育，依據社會工作辭典之定義，係為家庭提供有關兒童、青少年發展及教養子女的知識，以便使父母扮演適當親職職分的教育過程。其範圍廣泛，從指導父母瞭解嬰兒營養、兒童保健、就學、社會行為、性教育至指導父母協調家庭關係，與善盡其對社會所應盡的責任都屬之（黃貴美，1987）。所以，親職教育可以提供父母學習的

機會，讓父母隨時調整自己的角色，也讓父母具備讓子女健全成長所需的知能，並實施最有效而正確的教養方式，落實有效的親職實踐。

林清江（1986）認為親職教育應有廣義和狹義雙重意義，廣義的親職教育是指培養所有（包括現在與未來）的父母成為健全的父母；狹義的親職教育是針對某些不健全的父母而實施，幫助其改進教養方式，而成為健全的父母。黃迺毓（1988）指出家庭教育是父母在家庭裡對其子女所施予之教導。親職教育則是從生活的照顧、了解孩子的發展與需要、解決親子間的問題等等，到培養子女正確的人生觀、建立良好的溝通、達成家庭目標等。

井敏珠（1995）指親職教育是協助已為父母或將為父母者，了解自己的職責，提供有關兒童、青少年發展的知識，及正確的教養態度、有效的教養方法，以促進子女身心健全的發展，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扮演適當職分的教育過程。

黃德祥（1997）指出親職教育則重視子女身心發展的需求，強調父母如何學習有效的教養或教育子女的方法與技巧，在子女成長過程中適時與適切的提供助力，使子女健全成長，關注子女的特質與個別差異，強調誘導、鼓勵、民主與助人技巧的有效應用，教育的重點在父母。

親職教育的實施內容包含甚廣，不過其實施內容大致可分為：父母角色的認同、子女發展與適應問題、行為問題的輔導策略、父母管教方式與態度、人際關係與家人關係、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幸福美滿家庭之

孕育、家庭結構與溝通，以及社會資源的有效運用（黃德祥，1997；邱書璇等，1998）。親職教育的內容實施不外乎是希望協助父母擁有良好親職教育觀念，藉著觀念的建立，瞭解為人父母應盡的責任與義務，教養子女的態度與方法，以及如何正確地與子女進行良好的互動與溝通，以增加親子間的關係。

親職教育的內容應包含促使父母瞭解親職是一種成長過程，主要是父母的個人成長會影響親子的互動。依兒童的年齡與發展階段，家長須瞭解其身心發展，給予適當的幫助與情感的支持。因此親職教育的內容不只是學習兒童的發展理論與需求，更需瞭解父母在親職角色上的影響與效能，如此才能充分發揮親職教育所學習相關的知能。

一般的親職教育內容可以整合為以下四方面：

- 一、訊息的分享交流：學校或是家長之間互相提供有關親職教育的訊息，以讓家長能獲得更多之教養知能。
- 二、教養技能的學習：透過閱讀、討論、角色扮演、分享等方式，以增進家長教養子女的技巧與知能。
- 三、自我覺察能力的提升：幫助家長檢視自己的角色功能，幫助家長內心自我省察及自我成長。
- 四、教養問題的解決：家長在教養過程中常會面對許多教養子女的問題，幫助其解決問題是親職教育主要的實施目的。

至於，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01 條之規定，需要接受親職教育的施虐父母應屬於林清江（1986）所指之狹義的

親職教育的實施對象而言。針對這類親職教育實施的內容，則依據個別施虐父母的實際需要而設計，因此，實施內容很可能是有不小的個別差異的。

二、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現況

自 2003 年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起，對違反法令的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者得令其接受 8 小時以上 50 小時以下的親職教育輔導，並收取必要費用。雖然親職教育輔導的小時數，由 2003 年起自 4 小時大幅度調高到 50 小時，但是國內這種具法令規定的強制性的親職教育輔導的實施，仍然充滿著許多執行上的困難與問題。

國內有關強制性親職教育的研究十分有限。過去十餘年來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探討社工員與施虐父母的工作關係，包括：張必宜（1995）；王行、鄭玉英（2001）；許嘉倪（2001）；黃元亨（2001）等；第二類為探討對施虐者的輔導模式，包括王行（2003）；王行（2002）；王行、鄭玉英（2000）；關漢中、鄭麗珍（1996）；馮燕、翁毓秀（1995）等；第三類則為探討改變要素或影響接受親職教育因素等，包括王行、鄭玉英（2000）；王行（2002）；林惠娟（2002）等。

關漢中、鄭麗珍（1996）以行動研究的方法，進行了解全國各地區執行「強制性親職教育」狀況時，曾做出結論，其重點為建議：家庭成員參與決策、因地制宜的實施與評量方式及建立正式關係的資源網絡等為努力方向。王行、鄭玉英（2001）強調「強制性親職教育」工作關係建立的特性與重要

性。王行、鄭玉英（2001）同時認為對「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理念模式，需首要建立工作關係。簡而言之，即為希望透過「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處遇過程，以一方面達到與「非自願性案主」建立「盟友」的工

作關係，一方面促使「非自願性案主」產生符合社會規範（prosocial）的行為表現，以防制不當親職行為的再發生。

「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對於兒童與少年保護工作而言，當然重點應置於保護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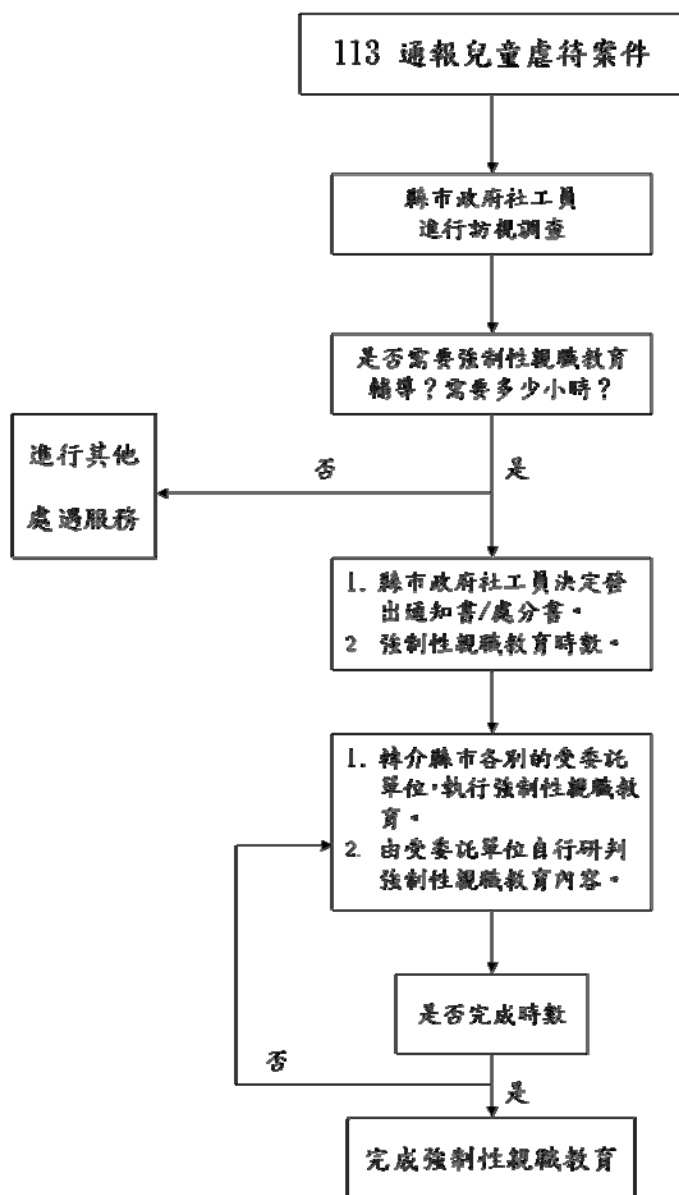


圖 1 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執行流程圖

勢，以「兒童利益」優先的考量，希望兒童及少年的主要照顧者能夠調整管教的方法與態度（林惠娟，2002），透過公權力的介入以「強制」的方式對施虐者進行「教育」（黃元亨，2001）。「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除了希望能直接協助施虐父母提升適當照顧或管教的知能與技巧；事實上，也間接強調了家庭功能的重要性及家庭對兒童與少年的不可替代的意義。兒少保護處遇計畫中，家庭維繫方案與家庭重整方案的施虐父母均有可能需要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家庭重整方案中的兒童返家計畫對兒童本身或整個兒童福利體系更具重要影響（闕漢中、鄭麗珍、劉玉儀，2003）。

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對施虐父母具其功能性，但是施虐者親職教育輔導需求具個別差異性與多元性，難以規畫出一套能符合所有施虐者個別需求的課程（蔡素琴、廖鳳池，2005），這也是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執行上的困難之一。

研究者整理目前各縣市政府執行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流程，流程中呈現出強制性親職教育時數與內容的制定過程，如圖 1。

從圖 1 可以得知，施虐父母所需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時數與內容是分別由縣市政府社工人員與受委託單位負責執行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社工員或心理諮商人員各自主觀決定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內容。朱美冠(2006)研究發現，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時數的判定仍無一定標準。委託的縣市政府把施虐父母需要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時數與相關資料轉介給受委託單位後，再由受委託單位來執行。縣市政府的預算多寡常能多

少反映對這項業務的重視程度。縣市政府編列了多少預算在這方案上？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執行預算、執行狀況、執行模式、執行困難、委託單位與受委託單位如何互動？與委託單位是否滿意？等等問題是本研究欲探究的。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各縣市政府社會福利行政單位如何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進行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方案的執行。由於時間的限制，研究者聯絡中部地區縣市政府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負責人，獲得三個縣市政府業務負責人同意接受深度訪談，其中一位是來自都會商業經濟型態，兩位是來自較農業經濟型態。都會商業經濟型態地區尋求委託執行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機構或提供親職教育輔導的專業人員比起較農業經濟型態的地區要較容易。這兩大類型大致代表了臺灣地區不同社會發展的程度。

絕大多數的縣市政府將強制性親職教育的業務委託地方民間機構辦理。縣市政府與民間機構間的分工為縣市政府業務承辦人員負責行政事務，包括：開立處分書或通知書，並以公文書通知施虐父母、建議施虐父母應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的時數、委辦服務的招標、承辦契約之訂定與執行、與受委託單位間的定期或不定期聯繫、委託服務的撥款與核銷及評鑑等業務。受委託單位重點工作包括：委託前的投標事宜、得標後契約的簽定、家庭訪視、安排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專業人員與施虐父母間的配對、安排執行場地、事

前的連絡、事後的收集紀錄、核銷業務、製作成果報告等等。從表 1 可以得知，負責承辦業務的時間均不長，平均在三年或以下。這可能與服務單位內部業務調整有關，因為社工員或社會福利行政人員通常沒有選擇業

務的權利。當然也常常發生業務才剛熟悉，又被分派負責其他業務的狀況，這是普遍現象，因為社工員的流動率是相當大的。因此，負責業務的縣市政府社工就常常變動，這是平均承辦年資不長的原因之一。

表 1 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縣市政府承辦人員年資

單位編號	受訪人員年資
G1	兩年
G2	兩年
G3	三年

本研究以半結構訪談大綱做為研究資料收集的工具，研究對象是縣市政府承辦強制性親職教育方案業務的社工員。由研究者親自進行 1 至 2 次，每次大約 90 分鐘的深度訪談。訪談錄音帶交由研究助理進行轉錄為逐字稿。研究者將轉錄的逐字稿重新校對，並將訪談過程觀察筆記加入逐字稿，使資料更完整。最後將逐字稿進行登錄與編碼，進行歸納、整理與分析。

半結構深度訪談大綱內容，除了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外，內容包括：業務執行預算、執行狀況、執行模式、執行困難、委託單位與受委託單位如何互動？與是否滿意？等等資料。

肆、資料分析

深度訪談縣市政府承辦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的社工員，目的在了解縣市政府在

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的預算、執行現況、如何與委託單位互動？對委託單位的滿意度如何？等等問題。茲將所收集資料分析陳述如後：

一、縣市政府有多少預算在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上？

對縣市政府而言，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應是兒童及少年保護業務中的一小部分，是在兒童與少年緊急保護措施之後，提供施虐父母強制性親職教育，使兒童能夠生活在較安全的家庭環境或做為兒童返家的準備。縣市政府轄區內兒童虐待案件數越多，所需的預算經費就會越多。

“縣府這邊大概是 15 萬左右。” (G1)

“…一開始都是十幾二十萬。…希望能夠實際去精算需要編多少預算來做這個。我是 96 接的，…，那時候還是編 50 萬，但是 96 執行下來，預算也有增

加，…，因為我們有跟他們講說，希望訪視的頻率，和實際上的狀況不要差太多，後來的執行率也有比較好。因為我們是用限制性招標的方式，比如我們預計編50萬，最後決標數是40幾萬，真正執行時差距就不多。”(G2)
 “因為我們是跟家處(家庭處遇)、高風險一起，等於是把兒少保的後續工作與一些宣導作業綁在一起，每一個單位是200萬，所以一年XXX是600萬，都包在裡面沒有特別是多少。”(G3)

從上面可見，各地縣市政府在處理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大不同，金額差異也相當大，當然經費與各地人口多寡有密切關係。多數縣市政府會編列專門業務預算，但是也有縣市政府是包含在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方案的家庭處遇與高風險家庭服務方案裡。有專門預算的縣市較能夠清楚知道該縣市在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上的花費，但是包裹在兒童及少年後續輔導與預防宣導作業預算裡的就無法知道其在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上的預算了，除非受委託單位在年度核銷時，將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核銷金額分割出來，縣市政府是無法知道受委託單位在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上的花費的。對於分配有預算的縣市可能是在有限的社會福利預算中，在整體社會福利考量下做出的分配。但是對於包裹預算的縣市則似乎是由受委託單位來分配，受委託單位可能會就其掌握的整體資源來考量，就未必能完全符合委託單位在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上的期待。簡言之，有明確預算經費項目的縣市較能掌握確實預算與支出。

二、縣市政府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執行模式

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在該縣市是如何進行的？各縣市政府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執行模式是多元的，包括：講座、個別輔導及小團體輔導等方式進行。

“…個別輔導的課程模式主要是說，來上課的時數加起來還不足開罰的時數去用個別指導去補足，今天這個人來上4小時實際是開16小時，再去補12小時的個別輔導…”(G1)

“…有一些個別的，因為我們這次是配合開案指標的部分，…，其實這個指標對應出來是團體，…，個別的部分就是他童年受暴，自己是受虐者長大後成為施虐者，…”(G1)

“我們每年都有編小團體跟個別，但是他送來核銷的部分，97年一整年訪視總共是243人次，…”(G2)

“有團體的、有一對一的、有教育宣導的。親職教育宣導還有辦兩梯次，也有包括親職一日營的活動。”(G2)

“…，以往最高就是16，大部分都是一起上課，剩下不足的部份就是到宅服務的部份。今年度就是在個別、團體跟家庭的部份區分3塊，以基礎教育課程就是認知教育部份，他就是照時數，其實在指標裡面，分個別家庭跟社區去對，對到哪個部份，他符合哪一個課程，再來統計，來計算他的課題需要上多久？團體需要上多久？”(G1)

“…，我們這邊開立處分書，給委託單

位，再看家長有沒有時間做練習，鼓勵他們上課。” (G3)

從上面得知，縣市政府在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執行模式上大都分為個別、小團體與上課的方式進行。個別輔導除了到第三地點進行外，還有到宅服務的模式。有的縣市對於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的投入相當多，例如：從內容、方式與小時數等，都試圖以系統的方式來進行；但是有的縣市負責開出小時數後，即交由委託單位辦理，也不干涉受委託單位如何執行。

三、委託單位如何與受委託單位互動？

縣市政府與受委託單位間的互動對於業務的執行是很重要的。縣市政府與民間單位的聯繫，多為行政的本質，例如：招標、請款、核銷等行政事務；較少專業上的互動，例如：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小時數的訂定、要上哪些課程內容等。雖然有些時候行政上互動與專業上互動很難區分，研究者認為區隔他們還是有其價值。茲將分別討論於下：

(一) 行政上的互動

縣市政府與受委託民間單位在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行政上的互動包括：委託簽約、徵詢承接意願、徵詢受委託單位需求等。

“…以往都是跟他們合作，長期以來也都是這樣，就是沒有變，很固定，時間到了就提案子上來了，沒有再特別說，會問你們今年要不要接，會看看總幹事的態度，由總幹事來決定到底要不要接…” (G1)

“…，其實他們有什麼需求啊，像去年

度他們就是希望說跟我們社工開一個會議，他們可以了解案家狀況，我們都說OK啊，我們絕對可以配合。有時是他們自己內部會沒有喬好，其實他們一些社工做的時候都哇哇叫，他們本身承接很多方案，再來接我們的方案，其實他們都覺得我們這個方案瓜分他們很多時間，…” (G1)

“當然能夠比較密切，一個月至少要1次，……，我在跟其他業務的委託單位是很頻繁，幾乎每天都在聯繫。你必須隨時去了解他有沒有什麼狀況，有沒有需要你協助他處理，因為可能他有時候遇到公權力的問題，這部份會是需要我們協助的，…，互動應該是要頻繁的，而不是到開課時間再聯繫，就很奇怪。” (G1)

“我們比較困擾的是，我們和他們合作，只要換承辦人，他們XX一年會換一個承辦人，那個業務就會在摸索中。行政面、招標等，等真正運作了一年，你才會真的知道那個問題出在哪裡…” (G2)

“…，像是我96接方案時開始開，原本是希望一季開一次不過變成一年2次，希望是類似一個檢討會，可以討論社工個案執行狀況、成效情形，是需要結案還個別方式輔導。96.97各開兩次，希望是大家在一起開會，不過大家都很忙碌，最後變成小組分散式開會。” (G2)

從上面行政上的互動可以得知，縣市政府除了在年初要完成委託契約所需要的行政

互動之外，在一年之間還會有固定的聯繫會報或不定期的電話行政連絡，以確實掌握委託案執行狀況。較讓縣市政府傷腦筋的是受委託單位經常換負責人，或許是因為受委託單位認為業務太複雜，內部同仁不願承擔。

(二) 專業上的互動

縣市政府社工似乎急於與受委託單位有更密切的合作關係，縣市政府希望受委託單位能夠更積極主動合作，相互在專業上有更多的合作。專業上的互動多著重在個案接受輔導的時數上。有些縣市政府是由家庭處遇社工與縣市政府社工共同討論而決定；有些縣市政府請外聘督導來進行較客觀的評估，希望在開立小時數與內容上能有更客觀的依據。

“XX的社工員較僵化，只固守在自己的體系中，我們所辦的訓練都是想要幫助他們像是兒保、性侵等。不過他們參與的比例不高。其實我們站在一個合作關係當然會希望有一個平臺大家一起做討論，討論方案如何可以更好。” (G2)

“…，他們個案有重疊的部份就會有個案研討。…，其他則是私底下找承辦人員作討論，作法作些修正等基本上以個別和非正式聯繫。正式大概是一年兩次。” (G2)

“…，一開始是由府內社工員開時數，有一點自由心證去評估要開多少時數。後來在工作聯繫會報中提過是否由後續執行單位，我們轉下家庭處遇單位之後，再由家處社工員與府內社

工員共同討論需要開立多少時數。去年我們有兒少保的工作手冊，有一點類似SOP流程，就是制定評估標準時數，大概有哪些課程需要上多少時數，其實我們還沒有真正去實行，…，目前還在做協調看如何去落實這些評估表。因為我們之前有請外督老師去制定這些時數，其實有更客觀去開立時數。” (G3)

“…，就是會互相討論專業上的問題。有時是因為單位與我們各有各的角度問題，就是互相討論，找出解決方式。但有時是因為可能不會發生，但是會先預期很多狀況發生而害怕。” (G3)

從上述可見，專業上的互動會因各自的角色不同而各有立場，委託單位對受委託單位也會有一些專業上的意見。經過專業互動的過程，委託單位能夠考慮受委託單位的專業考量，形成對案主較佳的合作模式。對於一個不甚成熟的服務模式而言，雙方各有立場自是可以預見的，只要雙方意見均是為施虐父母與受虐兒童的權益而考慮，都將是值得嘗試的。

四、對於目前受委託單位的滿意程度如何？

縣市政府對受委託單位的滿意程度可以從受訪者的語氣與談話內容上清楚感覺得出來。其中 G1 與 G2 的狀況相似，受訪者對受委託單位有莫可奈何的情緒。

“當然是希望去扶持她們。” (G1)

“…，家庭處遇就是有家訪的次數，對家扶而言是融在一起，要呈現出家訪

是否有跟方案有結合，訪視家庭改善狀況如何，我們期待XX的社工能力更強，因為他們可以扣緊這塊執行狀況。”(G2)

“…，但我們知道他們的社工員流動率高。…，但其實我們會期待過高針對強親這個部份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訓練，像我們所舉辦的訓練他們較少參與。…，像是96.97年中央有辦一個強親訓練，由於他們承辦人員是新的，照理應該要參加，不過我發了兩次文，也都打了電話，依舊沒有回應。(G2)

“因為我們是三個單位，會有比較。可能是因為單位他們的歷程與經驗有差異，有一些新單位在遇到一些狀況不能處理得完善，會把問題丟回來給我們，希望我們重新評估狀況、處理。

同一個狀況在其他單位會較好。”(G3)

在有些較偏遠的縣市，社會福利資源本來就較匱乏，福利服務方案要委託出去本來就相當困難。因此，盡力培植，不忍苛責的狀況經常存在。G3 因處於都會區社會福利資源充沛，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是包裹在家庭處遇方案裡的，由三個大型福利機構承接方案。大型機構由於本身資源較充足，人力資源也相對穩定，承接大型的服務方案的壓力自然就較為低。但是儘管是如此，G3 對三個大型機構的滿意度也不盡相同。

五、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執行困難

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執行上的困難包括：法源依據薄弱、受委託單位頻頻更換承辦人、開罰擔心破壞社工員與施虐父母的關

係、案家地處偏遠，交通困難等。對於不合作的施虐父母開罰，並未產生效果，因為施虐父母繳交不起罰鍰的大有人在。

“…，社工人員開親職教育罰單會破壞跟案家的關係，另外一部份就是你開了強制性親職教育他不來上課，公文後面會寫會開罰，罰款部分大家會以為說是要社工人員去追討，礙於這兩個因素，所以大家都不太願意開。”(G1)

“我們比較困擾的是，我們和他們合作，只要換承辦人，他們XX一年會換一個承辦人，那個業務就會在摸索中。行政面、招標等，等真正運作了一年，你才會真的知道那個問題出在哪裡…。(G2)

“…，中央要規定統一一致，我覺得強親法源依據很薄弱沒有強而有力，我們可以像兒少保很強制執行它，其實我們在執行上的困難也是認為說真的就是沒有強制性，我們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工作。”(G1)

“…，為什麼他們的執行力那麼不高，才發現他們會有一些個案是不來的，或者是遇到交通問題。因為南投幅員較大，所以我們就希望能將問題克服。比如今天個案住在埔里，那我們就能將活動辦在埔里。或者是時間要彈性要配合個案的時間，例如個案都是六日才放假，…，若排團體都辦在一到五，他怎麼樣都無法參加。…，需要做一些個別的：有些交通不方便或需要帶小孩，我們就請他就近能夠到

案家，或者是案家不方便，找一個較大的點，譬如埔里這一塊地方……。”

“……，我們也有討論說要開罰的問題，但因為縣市政府都不啊。譬如我們強親的有要開罰，就必須編稅出稅入，但一編之後，假設說案主會主動來繳錢也是偏低。像一些個案必須要自付，對我們而言，執行上也是相當困難，因為一些個案通常都沒有錢。”

(G2)

屬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的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雖是兒童及少年福利的評鑑項目之一，但是縣市政府社工員通常不會親自執行。當然此與目前兒童及少年保護業務多採一線與二線分工的方式進行有關，即政府社工為一線，民間組織社工為二線，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處理兒童及少年業務時，常需要公權力的介入。

受委託單位雖然承接業務，但是業務負責人卻頻頻更換，對於複雜的委託作業程序而言，實在是縣市政府承辦人員頭痛的事，也同樣是受委託單位須適應的。有時，碰上縣市政府也剛換主責社工，往往年度都已過了好幾個月，委託契約都還未完成。可見，委託單位與受委託單位對於雙方的頻頻更換負責社工對於執行強制性親職教育業務都有這強烈的無奈。

伍、結論與討論

本小節依據所收集資料，提出結論與討論。

一、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預算要編列多少才適當？

預算多寡決定輔導執行多寡。2011 年的兒少保護案件已達 17667 件，案件持續增加親職教育輔導預算也應該相對的比例增加，才能滿足這項業務的需要。縣市政府對強制性親職教育的預算編列可以依據該縣市兒少保護案件增加的比例，來編列適當的親職教育輔導的預算，才能滿足需求的增加。

二、哪個部門執行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較適當？執行人員是否足夠？

編列預算可能並非唯一的問題，因為有預算，跟著來的是執行預算的問題。對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而言，是否有足夠的專業親職教育輔導的專業人員來執行，也是縣市政府承辦人員所擔心的。

親職教育輔導應由哪個部門來負責？是教育系統？還是社政系統？若將親職教育視為是家庭教育或社會教育的一環，親職教育顯然應是教育部門的業務。就目前的狀況看來，一般性的親職教育，或稱為兒童保護服務中的初級預防工作，可以由家庭教育部門來負責宣導。但是，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是針對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的施虐父母所需接受的「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是由社政系統主管。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與一般性的親職教育是不同的。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是針對個別案主量身訂作的，除了有具體目標外，也有特殊目的，由社政系統主管是責無旁貸的。

三、執行模式多元，但是各縣市政府涉

入執行模式的程度不一

有的縣市對執行模式涉入較多，諸如：模式設計或小時數等；有的縣市則授權受委託單位全權處理。有的縣市設計為多個單元，視案主的需要組成不同的套裝。

四、到宅服務的個別輔導，輔導人員安全堪慮

強制性親職教育個別輔導模式，除了安排在公共地點的第三地進行之外，也有少數是到案家進行服務。這些在案家進行的輔導人員，其安全性是值得關注的。

五、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執行上的困難

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執行困難，包括：法源依據薄弱、開罰的實際困難、輔導執行上的困難、業務承辦的不穩定等等因素。強制性親職教育業務在兒童福利業務項目中是較複雜的業務，因為業務涉及委託民間機構、執行輔導人員難求、輔導內容複雜、業務額度不穩定等等因素，使得民間機構通常興趣缺缺。

社工員不論以通知書或是處分書通知施虐父母接受親職教育的同時，也擔心會破壞很難建立的工作關係。因此，對開立通知書或處分書是相當保留的。這種普遍現象可能影響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的總人數。至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101 條有關親職教育的相關規定用的是‘得’，而不是‘應’，使得必要性與強制性降低了許多，也可能影響了其執行力。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並不是緊急業務，因此常以委託民間單位辦理。可能由於一方面是民間社會福利機構辦理，另

一方面，以通知書或處分書的方式通知、第 101 條規定用的是‘得’，而不是‘應’及法令上只有罰金的罰則等因素，產生不了案主‘一定’需配合完成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時數的認知，而造成執行上的困難。民間單位的社工員在執行這項服務時也只能以勸說的方式，鼓勵施虐父母完成開立的時數。

須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施虐父母，若他們不認為他們的管教方式是錯誤的或是需要改變的，他們就根本沒有接受的動機。人的行為若沒有動機，效果就會大打則扣。這也是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最根本的困難所在。

六、加強委託單位與被委託單位間的專業互動

國內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雖已實施多年，但是不論是委託單位或被委託單位常因許多因素，例如：業務規模小不受重視、承辦人經常變動、承辦人專業經驗不足等等因素，使得這項業務成燙手山芋，常陷入不辦不行，辦起來又不知如何將它辦好的窘境。

七、委託單位對被委託單位感到無奈多於滿意

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在諸多社會福利服務項目中，應可算是難度與複雜度均較高的業務。由於它的特性使得有心想承辦的小型機構，為之卻步；大型機構他們有許多承接服務方案的機會，對於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這種十分需要人力與專業能力的服務，經常不是他們優先欲承接的方案。因此，使得縣市政府承辦人常須拜託當地福利機構承辦強

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方案，有些機構其實承接得十分勉強。如此一來，委託單位也就無法過度期待，只因為它是評鑑項目，不得不執行的窘境。

陸、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

一、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預算的編列

預算是業務執行不可缺乏的要素，但是預算要編列多少才能符合需要。建議可以計算出前一年度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個案占全部通報個案數的百分比，乘以年度通報案件的增加率，再乘以該年度的預算數，就可以估計出相對正確的預算需要，以避免過度編列或編列不足的狀況發生。

二、提供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時，輔導人員的專業能力

強制性親職教育有別於一般親職教育輔導。建議提供親職教育輔導者最好能具備有關兒童虐待的相關知識，例如：兒童虐待的成因模式、家庭動力、家庭成員關係等等知識，有助於問題的瞭解、輔導的進行及輔導內容的規劃，才能對症下藥。除此以外，由於兒童虐待行為常與家庭中其他的壓力因素有關，因此，了解相關的家庭福利服務措施也有助於與其他社工人員合作。

三、建立多重單元組合的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時數

縣市政府承辦社工通常並不會直接提供

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服務，因此他們其實對大部分的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內容並不熟悉。目前的狀況卻是：這些社工員需決定施虐父母應接受多少小時的親職教育時數。若能依據個案的類型與嚴重程度規畫出多重單元組合式的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總時數，將能系統化與科學化的執行強制性親職教育，而不是全憑社工員的感覺與經驗來決定接受的總時數。

四、贏得施虐父母的信任及激發動機是相當最重要的

施虐父母接受的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是被動的、非自願性的，是缺乏動機的。因此，社工員若能先與施虐父母建立信任關係，再提出接受親職教育輔導的相關事宜，就會比較容易被接受。通常社工員若能先提供施虐父母的一些具體服務（concrete services），例如：津貼補助、交通服務、子女營養午餐費等服務，能夠很快地贏得施虐父母的信任，使得接下來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會較容易。再則，行為若無動機是無法激起學習的，因此，積極鼓勵是重要的。

五、共同討論施虐父母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的時數與內容

委託單位與受委託單位共同討論個別施虐父母應接受哪些內容與時數，能夠提高受委託單位的參與感，以提升承接的意願。受委託單位可能比委託單位更了解個別案主的需要，經過討論能夠提供更符合施虐父母需要的輔導內容。

六、進行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成效性研究

到目前為止十分缺乏有關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成效性研究。建議進行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成效的研究，以了解強制性親職教育到底在預防兒童虐待的再發生上產生了哪些具體成效？研究結果也能提供改善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業務具體改善方向。在當前社會工作也常被期待提供以成效為導向的福利服務的大環境下，能夠提供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委託單位與受委託的執行單位一個重要的參考依據。

七、結語

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是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01 條規定發展出來的服務項目，其主要目的在於提升被通報父母的親職技巧與照顧子女的能力，預防再度施虐的發生。兒童虐待的原因很複雜且多重（郭靜晃, 2004），親職功能不彰、親職技巧不佳、親職知識不足等，只是施虐原因中的一部

分。為了達到降低重覆施虐的可能或預防施虐的發生，實施親職教育是不足的。強制性親職教育有其特殊性，雖已實施已近 20 年（自 1993 兒童福利法通過起），但是探討有關強制性親職教育成效的研究十分缺乏。強制性親職教育到底發揮了多少成效？對於兒童虐待的再發生，是否發揮了預防的效果？各地縣市政府如此努力的進行著，結果又如何呢？接受親職教育的人次、參加團體的人次、參加親職講座的人次等等資料，並無法呈現親職教育輔導對施虐父母所產生在扮演親職上的改善。換言之，無法呈現親職教育的效果。缺乏成效性研究成果就無法使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執行人員知道怎麼做是有效果的？哪些是沒有幫助的？因此，研究者期待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成效性研究很快的能出現，以科學研究的方法引導未來的強制性親職教育。（本文作者為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副教授）

關鍵字：Entrusted, Parenting education, abusive parents

參考文獻

內政部兒童局（2011）。

http://www.cbi.gov.tw/CBI_2/internet/child/。

井敏珠（1995）。已婚職業婦女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社會支持之研究。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博士論文。

王行（2002）。明夷錄：為「認定的失虐者」之基變治療要素，走出創傷－兒童保護及家暴目睹兒童個案處遇研討會手冊，內政部兒童局主辦。

王行（2003）。低眉菩薩：兒少保中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模式的追尋。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的新挑戰研討會。彰化鹿港。

王行、鄭玉英（2000）。毛毛蟲與變形蟲：為「施虐者輔導」之行動研究中知識建構的「變」，

-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報，8，153-182。
- 王行、鄭玉英（2001）。非自願性案主會談策略之行動研究－以兒保之「施虐者」為例，國科會研究結果報告。
- 朱美冠（2006）。做個好父母？非自願個案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政策之施行與反省。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家興（1997）。如何實施親職教育。諮商與輔導，63，2-4。
- 林清江（1986）。親職教育的功能與實施方法。師友，228，6-10。
- 林惠娟（2002）。「我為什麼來上課？！」影響案主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因素之探討，兒童福利，3，49-72。
- 邱書璇譯（1995）。親職教育－家庭、學校和社區關係。臺北：揚智。
- 翁毓秀（1995）。諮商中抗拒的處理，輔導季刊，34(4)，54-59。
- 張必宜（1995）。社工員與施虐父母工作關係之形成與內涵：以臺北市兒童少年保護個案為例，臺灣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嘉倪（2001）。兒保社工與施虐父母工作困境及因應之初探－以臺北市為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馮燕、翁毓秀（1995）。兒童保護工作中「施虐者輔導方案」研究。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內政部委託研究。
- 郭靜晃（2004）。兒童少年福利與服務。臺北：揚智文化。
- 黃元亨（2001）。不要破壞我的家－被認定為施虐父母之當事人對強制處遇介入經驗之探討。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黃迺毓（1988）。家庭教育。臺北：五南。
- 黃貴美（1987）。農漁村親職教育實施現況及需求之研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計畫。
- 黃德祥（1997）。親職教育。臺北：偉華。
- 蔡素琴、廖鳳池（2005）。實務工作者對於兒虐施虐者親職教育輔導課程需求評估之探討，諮商輔導學報，12，1-34。
- 鍾思嘉（1998）。二十一世紀的親職教育。臺北：桂冠。
- 闕漢中、鄭麗珍（1996）。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模式之研究與評估，內政部社會司委託研究報告。